

项城“75·8”抗洪档案

张甫堂 刘雅君



资料照片

伴随着7月、8月雨季的到来,中原特殊的地理位置都会面临极其严峻的防汛形势。我们周口位处黄河流域故道,全市境内沙颍河穿城,贾鲁河、涡河、汾河、蔡河水流丰富,历史上多经水患。22年前1975年的那个夏天,8月5日至8日,洪汝河、沙颍河上游普降大暴雨,山洪暴发。驻马店板桥、石漫滩等水库相继溃坝,洪水侵入周口、西华、项城等地。项城市档案馆存县委卷宗档案记录“项城汾河以南七个公社被淹,35.6万人受灾,房屋倒塌22万间,34人不幸遇难。”仅从项城档案中,已见这场洪水来势凶猛,给全市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。

在项城市档案馆,不仅有县委卷宗记录了这次抗洪,还有一套项城市抗洪救灾指挥部编印的《抗洪救灾报》,这份珍贵的报纸是项城唯一一套关于抗洪救灾的地方报纸。2010年,项城市政协资料编辑部根据项城市档案馆的这些馆藏资料,和当年抗洪救灾亲历者的回忆,编辑整理出《项城“75·8”抗洪救灾资料集》。透过档案资料数据,“75·8”抗洪的情景历历在目。

1975年,项城有17个公社(镇),376个大队,3690个生产队,73.7万人,103.6万亩耕地。

1975年8月5日至8日,洪汝河、沙颍河上游受三号台风影响普降大暴雨,中心地区的降雨量高达1382毫米。

8日,洪水由平舆境内侵入项城。次日,上蔡境内的洪水接踵而至,造成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,水深2米左右,停留时间达20天之久。汾河以南7个公社(贾岭、李寨、三店、孙店、老城、新桥、付集及高寺的汾南部分)被淹。

8月6日,县委、县革委召开紧急会议,成立抗洪指挥部,动员全县10万民工。指挥部研究决定舍汾南、保汾北,即固守汾河北堤、沙河南堤和直河西堤。组织范集、永丰、官会及高寺3个公社的5万民工,日夜防守在汾河北岸,加高河堤,严阵以待。县委明确命令,分工负责,分段把守,如有退却,临阵脱逃者,当场正法。

《抗洪救灾报》第1期刊发救灾新闻。“8月11日,中共中央给河南省委、省革委、周口地委发来了慰问电。向灾区的广大群众,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抗洪大军致以亲切的慰问。号召灾区的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、工人、贫下中农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,团结起来,向洪水灾害进行顽强斗争。”同时,“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同志为团长,以中共中央委员、人大常委、副委员长乌兰夫同志,农林部部长沙风同志,国家计委副主任邓东哲为副团长的中央慰问团亲临我们灾区慰问,指导抗洪救灾工作。”

《项城市政协文史资料之“75·8”汾北抗洪保卫战》中记载,“8月8日下午,洪水脱缰的野马奔腾而来,上级领导果断决定,炸开老城以南的柏油路,让洪水东泄。”“汾北保卫战胜利了,北半县50多万亩良田喜获丰收。”

《项城“75·8”抗洪救灾资料集》中,洪灾亲历者口述回忆了这段不寻常的经历。贾岭公社苏阁大队王汝正回忆:8月8日,生产大队根据公社指示,组织全大队2000多名男女劳力修筑了4000多米的护庄堤。9日,公社紧急通知,必须紧急转移群众,全大队2760名群众向安置地永丰公社谷楼大队转移。13日,洪水退去。14日,我率领生产队青壮年劳力返村,呈现在眼前的是片废墟,往日的苏阁村已不存在。

永丰公社谷楼行政村党支部书记谷喜堂回忆:8月10日,公社紧急通知,所有男青壮年劳力参加汾河固堤战斗。半小时之内组织四个村400个男劳力到场,经过一天一夜的艰苦奋战,我们

负责的大堤增高1米,加宽3米,锁住了洪水。

李寨镇乔庄村魏景泗,洪灾时26岁,他回忆:8月8日那天,晴空万里,大队通知说老王坡(西平县城东北)以西发大水了,很快会到咱这里,所有男劳力去打堤子。公社田书记命令道:全体共产党员,公社干部下水打木桩!一声令下,干部党员带领几千个民工硬是用木桩、用秸杆、用纤泥把河堤加高了三四尺。

还有范集陈克宽书记组织敢死队,扛门板、截柳树、装草袋、堵决口。共产党员张金言只身跳进激流闸内,差点献出生命。这些共产党员不惧洪水、身先士卒的事迹至今还在项城传颂。

经过十几个昼夜的激烈奋战,战胜了三次洪峰,抢修30多处险工,筑堤挖土220多万立方,使北半县免受了洪水的袭击。

一方有难八方支援,中国人民解放军、各地慰问团纷纷到项城抢险、慰问,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送达灾区。《抗洪救灾报》第1期刊发了援助新闻:“商丘33630部队首先到达我县,济南舟桥部队在接到抗洪命令后,24小时急行军1600多华里,立即投入战斗。开封、郑州的人民空军每天派十几架次飞机,连续空投18天,有救生器材和120多万斤熟食。另外,解放军和外队派来的医疗队21个,医务人员401名,为灾民防病治病。”

“截至8月22日统计:郑州市委、新乡、商丘、开封、平顶山、安阳、鹿邑、郸城、周口镇、周口地直机关、淮阳、太康、濮阳、西华泛区农场等兄弟单位,运来大批救灾物资,其中衣服20万件,麻袋3万条,布35000米,白面和熟食35万多斤,塑料布9000多斤,草毡19000条,鞋3万

双。”“那台汽车队飞车千里,运送救灾物资11970吨。开封地区派来机耕队,解放军还支援马匹702匹。”

国家先后共评发统销粮(包括种子、饲料)一亿零九百零二万斤,救济款一千九百七十七万六千元。救灾粮二万五千八百三十八吨,救灾柴油二千五百八十七吨,食盐一百零二万斤,木材三千八百立方米,救灾棉六十五万斤,布一百二十万米。

1975年冬到1976年春,国家为“75·8”灾区群众在平顶山煤矿、禹县神垷煤矿下发了免费的救灾煤,老百姓很多人都记得“只要有劲随便拉,不要钱。”有的人曾经去了七八次。

随着洪水退去,《抗洪救灾报》第3期陆续刊发关于生产救灾的相关新闻。“8月27日,中共河南省委发布了《关于发动群众大力开展生产救灾的指示》。号召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、工人、贫下中农、革命干部,团结一致,搞好救灾工作。”

灾区人民不畏灾情,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。“适时种足种好小麦和油菜,大干一个月,完成了三十三万亩小麦播种任务和六万七千亩油菜栽种任务。开展农田基本建设,修复水毁工程。投入劳力五万多人,修复机井325眼,修复电站16处,修整拖拉机216台,手扶拖拉机179部,柴油机592台,电机组108部,新挖排灌沟渠7条,新打机井164眼,深翻平整土地三万多亩。”“孙店大队掀起犁地送粪热潮”“李楼大队抓紧抢修农具、翻晒种子”“我县汾河治理工程全面施工”“赵堂大队因地制宜办小厂、生产自救干劲足”等。

1976年2月18日,项城县召开了生产救灾工作会议,总结生产救灾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,至此“75·8”抗洪画上了句号。



殷仲文和《枯树赋》

李郁

任侍中,兼任左卫将军。桓玄受九锡之赐,就是殷仲文写的诏令。

当年12月,桓玄篡晋称皇帝,追认父亲桓温为宣武皇帝。第二年2月,刘裕起兵反桓玄篡晋,4月,殷仲文随同桓玄出南京西逃至江陵。桓玄一行逃到江陵,重新置百官,又大兴刑罚,企图借个人威权,震慑百官将士。殷仲文作为大臣苦苦力谏,但桓玄不但接受,反而怒斥这个姐夫。

很快桓玄在江陵兵败被杀,称帝八十天,人权具亡。

而殷仲文因一路照顾胁迫西逃的皇后、皇太后有功而幸免。

义熙元年(405年),晋安帝司马

德宗刚刚复位,殷仲文便上表为自己辩解,请求辞职,晋安帝虽下诏不许,但只让他在京城当了个大司马咨议的小官。为此,他之前曾自望“必当朝政”的雄心壮志受到很大打击,从此官场失意。

殷仲文虽升迁失望,但他的文名却独步当时。开山水诗宗的谢灵运说他的“文才不减班固”,唐朝的宰相房玄龄在《晋书》里说“仲文善属文,为世所重”。至今有传世之作《人刻诗》《送东阳太守诗》《南州桓公九井作诗》等。

因仕途受阻,快快不得志,他心情非常失落。大司马府官厅前面有一

棵枝叶婆娑的老槐树。一次,殷仲文和众人集会在官府厅堂上,他对着槐树看了很久,叹息说:“这棵树枝叶散落,不再有生机了!”

殷仲文以树自喻的这几句话,竟成了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典故。

殷仲文死去150年后,因出使北朝而不得南归的南朝文学家庾信,对殷仲文当时的心情感同身受,受殷对大槐树发出的感悟启发,写下了千古名篇《枯树赋》。开头就是:“殷仲文风流儒雅,海内知名。世异时移,出为东阳太守。常忽忽不乐,顾庭槐而叹曰:‘此树婆娑,生意尽矣!’”而全篇的结束语是:“树犹如此,人何以堪!”

袁世凯与近代朝鲜

范阔杰

城,吴长庆率领大军随后跟进。吴长庆命吴兆有率部队跟随马建忠急速赴汉城,以壮声势。下午四时,马建忠偕僚僚吕增祥“驾小艇乘潮至马山浦。五点二刻,望见舢舨十只,满载我军士,以小轮船二艘曳着,鱼贯而来,登岸已七点钟矣。”

吴长庆命令黎明时分部队全体登陆,一名队官“奉命后,言兵士因不习航海,多数晕船,请求稍缓。长庆大怒,下令即将该军官撤职,交均发出看管。命袁世凯代理该营营长,兼先锋队,并给与令箭,谓如有不服命令者,即行正法。世凯奉命后,即刻部署,两小时内,完全就绪,向长官复命。长庆对众人夸奖。”²²

上述事件和下面的一个故事,被完整地记录在《张謇传记》中,作者刘厚生对袁世凯极有成见,但他治学严谨,秉笔直书,所以可信度是比较高的。刘厚生著作中的史料多源于张謇口述,所以这个故事情节出自张謇之口。刘厚生在文后也确实对这一点做了专门的交代。“以上叙述袁世凯初次露脸的情形,都是根据张謇的口述,非特官私文书所未载,即张謇之子孝若,编辑其父遗稿,亦不知有此一段故事也。”²³但刘先生的此段表述也有一个很大的疏忽,这里不得不作些考究,尽管有些繁琐,但对还原历史真相还是很有必要的。

清朝军制中,并没有营长一职。“营”下设“队”(即常说的“哨”),营的统帅叫管带,队的统

帅叫“队官”。如前节所述,吴长庆赴朝时,北洋水师运力有限,需调用南洋水师的军舰北洋,所以第一批出发时只带了两营四哨。两营分别是:右营,管带吴兆有;后营,管带张光前。从史料看,吴、张两个人都没有被撤职的记载,由此不难得出结论,违背军令的应该是统领一队人马的“队官”,即:“谢大师的栽培。”回头又向张謇请安,口称:“谢老师的提拔。”张謇觉得不好意思,连忙说:“这是大师对你的赏识,希望你不要辜负大师,多多为国家出力。”世凯连称是是。”²⁴

马建忠在其《东行三录》中记载的另一件事,

十分耐人寻味。他似乎在告诉我们:成功不只因为你能够做到有备而来,关键时刻,成功者还需要有一种精神,一种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,排除万难,去争取胜利”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。庆军中的绝大多数军官们,似乎早已失却了这种精神,而暮气沉沉。这也是袁世凯能在朝鲜很快脱颖而出而外的外部因素之一。

晚上七点,马建忠和吴兆有的先头部队登陆完毕。吴兆有以“嘘黑难进”为由,拒绝赶夜路,而命令部队就在浦口安营驻扎。大院君不谙外交,一味采取强硬态度顽固排日,而日本花房公使已经进驻汉城多日,情况不明,马建忠“以王京事急”,不得安卧,遂率众策马夜行,打着火把,在幽谷茂林间疾行五十里,凌晨“十二点钟抵南阳府署。”与留在那里的朝臣赵宁夏,“谈至漏四下,乃寝。”

次日上午九点多,右营部分军士赶到南阳府。不久大院君的信使亦赶到南阳府,再次带来函札和口信,日朝交涉已进入胶着状态。花房义质态度蛮横地向朝鲜政府提出七条谈判条款,并限定朝鲜政府在三天内必须给出答复。大院君将日本所列七项条款抄送交马建忠,并“请(他)速赴王京排解”。吴兆有本人带部分人员,中午时分才赶到南阳府。马建忠立即找到吴兆有协商:建议部队当天赶到水原,这样第二天就能到达汉



灯,越来越亮

王天瑞

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,无论在海滩还是在海岛,无论在山顶还是在谷底,无论在森林还是在田野……深夜里,如果没有灯光,那就是死寂,就是阴森,就是惆怅,就是毛骨悚然,如果有了灯光,那就是欢乐,就是自由,就是希望,就是绚丽斑斓。

夜晚,当我走在黄村大街上,看到满街闪烁的灯光,突然想到——唐朝诗人白居易早在一千多年前写的两句诗:“灯火家家市,笙歌处处楼。”

灯,为在黑暗中徘徊的人类指引光明。灯,是人类征服黑暗的一项重要工具。早在远古时代,人类就发明了用火把照明,并逐步使用火来驱寒取暖、烧烤食物、抵御野兽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,人类开始使用松脂火把照明,并逐步使用动物油做燃料,又逐步使用植物油做燃料。到了周朝,随着陶瓷和青铜器的出现和使用,人类发明了石灯、陶瓷灯、青铜灯。这样,由于油灯的横空出世,人类社会向前突飞猛进了一大步。有光明的地方,就有人类文明。灯,驱散了黑暗,点亮了世界。

新中国建立前后,黄村人家使用的大多是“老鳖灯”。这是土窑里烧制的陶瓷灯,其外形似椭圆形的老鳖。鳖背上有个突起的圆孔,通过圆孔往鳖肚里注油。圆孔上有盖,注过油后拧上盖子,既可防油撒,又可防火。再从老鳖伸出的长脖子上,把灯捻子塞进鳖肚里,使灯捻子浸泡油里面。这样,在鳖嘴处点着灯捻子,就可以照明了。那时,点灯的油,大多是桐油或豆油。老鳖周围还有几个小鼻子,穿上细绳后,还可以把灯吊起来,高灯下亮。不过,一般人家为了省油,使用的老鳖灯都比较小,只有当村里晚上唱大戏、说大书、开大会时,使用的才是大鳖灯,个头大,盛油多,灯火旺,能顶三四级风。会场柱子上挂起两盏大鳖灯,呼呼的灯火能一直着到三更天。

本来,煤油早在清朝时期就已输入我国,那时,煤油不叫煤油,国人都叫它洋油,但直到我国建成玉门油田、大庆油田后,普普通通的黄村人才用上煤油——我们自己的煤油。于是,千百年传承而来的动物油灯、植物油灯便走进了历史,突然降临人间的煤油灯则遍地闪光。

煤油灯的制作,有的很复杂,有的也很简单。找来一个小小的玻璃墨水瓶或药瓶,瓶口上放一个铁片,在铁片上钻一个眼,再用铁片裹一个细铁筒,铁筒里穿一个线绳或纸的捻子,把铁筒通过铁片的眼,插进玻璃瓶的煤油里,就可以点燃了。当煤油熬了的时候,就往玻璃瓶里添些油。当捻子烧短

了的时候,就把捻子往外拨一拨。当灯头上结出灯花的时候,就把灯花疙瘩挑掉,屋里也就自自然然地又明又亮了。你不要小看这种煤油灯简单、简易、简陋,但只要天一黑,家家都会把它点亮,借助它的光芒,继续白天的工作——女人纺花织布、缝补衣裳,男人讲耕论锄、谈天说地,孩子们读书学习、笑闹嬉戏……这灯光,给清静的乡间带来了温暖和欢乐。

还有一种煤油灯,俗称“罩子灯”。它那高挑的身材,活像一个细腰大肚宝葫芦。它那盛油的灯座和挡风的灯罩,都是用玻璃制成。灯头一圈有两个固定灯头的瓜子,还有一个控制灯捻子升降的小齿轮。灯头由螺丝与灯座相配合,可把灯头拧到灯座上。灯捻子的下端伸到灯座里。当灯座内注上煤油,灯捻子就把煤油吸上来。点燃灯头里的灯捻子,灯就亮了。黄村有几位在洛阳拖拉机制造厂工作的工人,他们都曾给家里买过罩子灯,但家人都不常用这种灯。他们说,这种灯喝油多,用不起。罩子灯大多用在机关、学校、企业、商场……因为,这些办公单位对于每晚多花三五毛钱不太在乎,甚至想都不想。

还有一种煤油灯,俗称“马灯”。这种灯,可用手提,可以遮风挡雨,更方便的是骑马夜行时,可以把它挂在马鞍上,因而把它叫做马灯。马灯,除了玻璃罩外,全身都是由铁或铝制成,用起来很结实。灯座,既是灯的座,又是储油箱,外侧还有一个突起的圆孔,可从圆孔里往储油箱加油。灯的中间部位是个圆柱形的玻璃罩,罩住灯头,既能遮风挡雨,还能增亮。罩外有两根缠绕的铁丝箍,护卫着玻璃罩。灯头里有一根可以上下移动的灯捻子,下端伸进油箱里,上端点燃发光。这种马灯,家中使用很少,大多在户外游走——挑灯打场护院,挑灯接送客人,挑灯办理急事,挑灯露宿野炊……

我曾听旁院的奶奶讲过这样一个故事。那时,奶奶任拥军排长。一位解放军小战士在她家养伤一个多月,伤势痊愈了,马上就要随队出发。奶奶捧着小战士的脸儿,亲了又亲,嘱咐说,胜利了,带回黄村看看……小战士泪流满面……奶奶站在路边高岗上,望着雄赳赳气昂昂的队伍,高高地举起马灯,灯光照亮了前方的路……

1897年10月21日,当科学家爱迪生点亮世界上第一盏电灯的时候,谁能料到,太阳般明亮的灯光又这么快地照进了黄村的家家户户。

“灯火家家市,笙歌处处楼。”

城。吴兆有“坚执不可,盛气而去。”马建忠震惊之余,派人去打探情况,原来吴兆有因为部队很多人在行军中中暑,而不愿继续行军。既然令不动眼前的管带,不带一兵一卒,“只身入汉城恐为人所轻”,马建忠只好在南阳府署再驻一夜,等待吴长庆的大部队到来。

次日八点钟,吴长庆书信到达,称“右军兵弁病溺,另派后营管带张仲明(张光前,字仲明)协戎率队前来,相偕进止。”张光前率部赶到后,马建忠与张协商,决定精选“筒枪队二百名,轻装疾走,期翌夕必抵汉城。”然时机已经错过。第二天,马、张二人人疾奔而行,到达水原东二十里时,与大院君的信使中途相遇,从大院君信中,马、张得知:由于日方提出的三天期限届满,朝方未作答复,花房已经准备在杨花津渡汉江,返回仁川,“其意盖存决裂”。马建忠立即吩咐赵宁夏派快马前去打探情况,花房义质已经渡江,赶往仁川军中。

朝日交涉已成决裂之势,和平的机会似乎已飘然而去,战争一触即发。

(未完待续)

注:
①马建忠著,《东行三录》。本小节中引述,除特别注明外,均出自《东行三录》
②刘厚生著,《张謇传记》,上海书店出版,1985年第一版,第8页
③同上,第9页
④同上,第8页